

庾信传论

鲁同群 著

中华书局

海外篇

庾信传论

鲁同群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庾信传论/鲁同群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11
ISBN 978-7-101-13468-1

I.庾… II.鲁… III.庾信(513-581)-人物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0160 号

书 名 庾信传论

著 者 鲁同群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周毅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7}{8}$ 插页 2 字数 262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468-1

定 价 58.00 元



序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诗赋对后代尤其是对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影响很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庾信诗赋用典较多，加上他入北以后的仕历不甚清楚，诗赋内容及其寓意较难正确把握，也不易理清他的思想发展脉络，所以许多学人也对之望而生畏，很少有人对他的生平和作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许多人注释庾信诗赋，都采用倪璠旧说；而二十世纪以来的各家文学史，对庾信的评价都非常简略，多停留在摘引前人的现成评语上，常给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如今，鲁同群同志经过十多年的刻苦钻研，对庾信的生平、思想及作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撰成《庾信传论》一书，彻底理清了庾信的家世、生平仕历、思想演变过程，并对其作品作出了崭新的解释，填补了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为庾信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鲁君 1968 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外文系，1979 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古代文学硕士学位，从段熙仲先生治汉魏六朝文学，1982 年即以《庾信研究》的学位论文得到学界和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从而获得硕士学位。嗣后留校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与余同事，相处甚欢，遂成忘年交。鲁君为人谦和忠厚，为学勤奋严谨，得到校系师生一致敬重和好评，曾被推举任系

副主任、校国际交流处处长等职，现任国际文化教育学院院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仍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并指导古代文学硕士生，从不间断。《庾信传论》一书，就是他在工作和教学之余，长期辛勤钻研所获得的重大学术成果。

南京师大的前辈学者，向以治学严谨、重实证而不尚空谈著称于世。鲁君师承这种学风，一切论述都以史实为根据，是本书最为显著的特点。论家世，则勾稽各史书中的有关材料，证实庾氏家世并不显贵，说明宇文逌《庾开府集序》所谓的“贵族华望盛矣哉”只不过是一种客套恭维。论生平，则不但对《周书》和《北史》本传、宇文逌《序》等史籍精心对照比勘，而且对作品中提及的有关材料都加以勾稽研究，通过排比考证，去伪存真，才辨明庾信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对于入北以后的仕历，由于史书及倪璠《庾子山年谱》疏误较多，鲁君从考证庾信的诗赋、碑志、表赞等作品作年着手，通过对这些作品内容的深入研究，排比勾勒出其入北后的仕宦经历。鲁君曾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一文，发表于《文史》第十九辑，受到学界瞩目，被日本爱媛大学加藤国安先生赞叹为不刊之论。特别是考订庾信在561年始在北方得任司水下大夫，在此之前只得空衔而无职事官，论据翔实有力，论证周密精辟，实为重大的创造性发明。鲁君对庾信入北仕历的考订，彻底订正了史书及倪谱中的错误，从而完成了一部崭新的也是最为可靠的《庾信年谱》，这是本书对学术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

前贤都认为庾信的代表作是《哀江南赋》《枯树赋》等抒写乡关之思的作品，又因为杜甫曾有诗云：“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于是，学人都认

为庾信《哀江南赋》等代表作都是“暮年”写成的，如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推测此赋作于宣政元年(578)，时庾信六十五岁。然而，鲁君在对这些作品进行逐首、逐句乃至逐词认真研究后，终于发现这些作品都不是“暮年”作品，而是入北之初所作。鲁君对每篇诗赋文章的考订真可谓细致入微，如从诗中的地名和典故考出《拟咏怀》之一部分作于庾信出守弘农之年，时在563年。又如从《哀江南赋序》中“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考明庾信从554年出使西魏被留至作此赋之时已有三年，又以赋中“日穷于纪，岁将复始”证知时在十二月，从而断定此赋作于周明帝元年(557)。为了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鲁君对此赋中的典故多作了确切的诠释。如指出“有妣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以及“天道周星，物极不反”，乃指陈氏代梁，梁亡不可复兴，并非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指梁元帝死后十二年再加十二年。而赋末“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乃指宇文泰和宇文护，并非如倪所说的“追叙二帝、诸王”等等，都阐述得非常贴切可信。尤其是指出此赋对557年以后之事(如梁敬帝于558年被害)只字未提，亦可反证被誉为赋史的此赋必作于557年，这些考证都极有说服力。鲁君通过各诗赋内证和典故的诠释，一一考明《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作于554年冬，《和张侍中述怀》作于555年至557年之间，《小园赋》作于555年或556年，《伤心赋》作于557年，《拟连珠四十四首》作于560年，《枯树赋》作于560年等等，由此论定所谓“乡关之思”的代表作，都是入北初期的作品。

那末，为什么庾信在入北之初写出那些作品？本书对此有精辟的论述。首先，从庾信入北初期仕历考察，他当时虽有“抚军将军”“车骑大将军”等戎号，“右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等虚衔，但实际上一直没有职事官，过着“从官非官，归田非田”的生

活,所以并不为人所重。其次,从这些作品内容来看,当时庾信处境困难,遭受谗毁,所以牢骚甚多。加上生活贫困,而庾信对自己又有不切实际的高自期许,所以这一时期乡思较浓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何况从常情来说,一个人初入异国,一切都不习惯,乡思自然会较强些,而当他在异国时间长久以后,特别是当他在异国得了官职,故国已被灭亡而无乡可归之后,乡思自然会消退了。所以,本书考定《哀江南赋》等一系列代表作为入北初期作品,不但根据充分,而且符合情理。至于杜诗所谓“暮年诗赋”“文章老成”,并未确指何年,在杜甫心目中,很可能认为庾信入北即为“暮年”“老”时,何况杜诗实含有以庾信自况之意。所以鲁君考定这些诗赋为庾信入北初期之作,并不与杜诗矛盾,只是订正了前人对杜诗的误解。这是鲁君对学术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二。

庾信入北以后的思想和心态,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及仕宦的升降,有一个复杂的演变发展过程。因此,在入北以后,其不同时期所写的诗赋文章的主旨并不都是乡关之思,而是有着多种各异的内容的。本书对许多作品的主旨作了深入探索,提出了正确的解释,订正了前人的误解。前人常把《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之八“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两句作为庾信晚年乡关之思的总思想,本书指出,此诗写于庾信初入北的554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间,只是江陵未亡前的心态。其时梁元帝父子生死未卜,庾信尚未仕魏,仍为使者身份,故有此二句。以“武昌”代指梁元帝所都之江陵,以三国时吴之新旧二都喻指梁之新旧二都。但在梁元帝父子被杀后,庾信就“不忆武昌鱼”了。当陈霸先代梁后,庾信就感叹“乌江舣楫,知无路可归;白雁抱书,定无家可寄”,此后庾信所作诗赋的主旨多不是乡关之思。作于555年或556年的《小园赋》并非如前人所说“愿为隐居而不可得”,而是对自己当时

“从官非官，归田不田”实际处境的真实描写。而作于 557 年十二月的《哀江南赋》，其主旨也并非乡关之思，而是向北朝政权求官，因为当时南朝已由陈氏代梁，南归无望。赋中炫耀家世，自称文武兼资，乃迎合北朝重门阀和尚武的风气；对江陵灭亡归于天命，自己入北亦为天道回旋结果，赋中严厉攻击梁元帝，将西魏进攻江陵归罪于南方，对于抗击西魏守卫江陵而牺牲的将士无一赞语，显然是不想得罪北方政权。赋中强调自己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显然是希冀能有舟楫以上星汉。参以《奉和赵王西京路春旦》《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卧疾穷愁》《幽居值春》等诗，明显可看出当时庾信不安于穷愁而希求用世。所以，鲁君指出，《周书》本传所谓“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不可信据。原因可能是唐时有太史令庾俭参修《周书》，俭之祖父庾季才与庾信同宗，《庾信传》出于庾俭之手，就出现刘知几所批评的“事有不同，言多爽实”了。

周明帝即位后，庾信与王褒等同时为麟趾学士。虽然脱离了“隐士”生活，但庾信的心情并不高兴。因为这并不是正式官职，只是一种差使，而且入麟趾者贵贱不同，才华悬殊。其作于 560 年在麟趾殿校书时之《枯树赋》，虽有同情南方士人在战乱中所遭受不幸的描写，但其主旨也不是乡关之思，而是与《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和《连珠》二十九、三十八等类似，乃是讽刺北方文士无才，自己羞与卑鄙趋走之徒同列以及自叹“沉沦穷巷，芜没荆扉”之意。至于《竹杖赋》的主旨，倪璠注认为“喻魏、周逼己以仕，……言己无情于禄仕也”。但鲁君在对全赋内容进行深入考察和逐词诠释后，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此赋乃受周武帝

赐于谨延年杖一事所触发,求官为“千里”(刺史或郡守)而作,事在 563 年,庾信时年 51 岁,符合赋中所说“未见从心,先求顺耳”之语。显然这一解释比倪注更切合赋意。

由此可见,考明《哀江南赋》《枯树赋》等许多作品的主旨乃求官之作或抒发牢骚之作等多种思想心态的作品,订正前人所说这些诗赋主旨为乡关之思,这是鲁君对学术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三。

本书中还有许多作者创造性的见解。对时代社会思潮和庾信思想的论述,对庾信诗赋美学追求及其前后期风格的继承和发展的探索,对庾信诗赋源流及其对后代诗人的影响的叙述,都有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新说,给人以启发。所以,本书是庾信研究的一个崭新的里程碑,是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达到最高水平的一部学术专著。

余与鲁君忝为知己,对鲁君的成就倍感欢忭,故略陈鄙见,聊以为序。

郁贤皓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于金陵寓所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	3
第一节 并不显贵的家世	3
第二节 并不萧瑟的生平	8
第二章 庾信三教杂糅与以儒为主的思想	41
第一节 三教杂糅的社会思潮	41
第二节 以儒为主的庾信思想	52
第三章 “夸目”“荡心”与清新自然	
——庾信前期作品的不同美学追求	85
第四章 乡关之思的起伏消息与宦海沉浮的喜怒悲哀	
——庾信入北后的心迹追踪	96
第一节 “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入北以后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	96
第二节 “犹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	
——554年冬的庾信	116
第三节 从“何时得云雨，复见翔寥廓”到畸只不偶的悲哀	
——“从官非官，归田不田”之一	124
第四节 欲达其言的故时将军与咸阳布衣	

——“从官非官，归田不田”之二	139
第五节 从事素王之业的东门贫民与他对北方文士的轻蔑	
——预麟趾殿校书	168
第六节 “由来不得意，何必往长岑”	
——从司水下大夫到弘农郡守	186
第七节 归栏的弃马又被远放山城	
——从司宪中大夫到洛州刺史	218
第八节 “更想东都外，群公别二疏”	
——致仕前后	226
第九节 本章结语	236
第五章 “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	
——庾信入北诗赋对其前期风格的继承与发展	262
第六章 肴核六籍之文，探索百家之旨	
——庾信诗赋源流试探	281
第七章 一个使杜甫十分倾倒的诗人	
——庾信对后世诗人的影响	293
第八章 身后是非谁管得	
——关于庾信评价的一点意见	308
附录一 庾信年谱	313
附录二 历代评论选辑	333
《庾信传论》重版有感(代后记)	340

引 言

无论是就六朝文学而言,或是就整个中国文学史而言,庾信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作家。同时,他又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作家。这种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为人,一是他的为文。争议自他死后未久便已产生,一直延续至今。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同一时期,不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也常常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但审美趣味、价值标准尽管可以各有不同,而评论必须建立在对作家生平经历的真实了解和对作品内容的准确把握上,却是一个共同的基本要求。笔者在本书中,力图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出发,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对庾信及其作品作客观公正的介绍评述。其中着力最多者,便是对庾信入北以后仕宦经历的考证以及在考证其作品写作年代的基础上,对历来被认为是庾信乡关之思代表作的《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作品思想内容的探索。这种写法与评传体例不尽相合,却是不得已之举,还望读者鉴谅。探索的结果,与古哲时贤颇有异同。然而笔者非敢苟为立异,凡自以为创获的浅见,一定详加论说,多方求证,以求先厌于己心。而今探索暂告结束,笔者斗胆将这本《庾信传论》呈于读者之前。灾梨祸枣,心固有愧;纰漏谬误,静俟博雅君子的批评。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

第一节 并不显贵的家世

关于庾信的家世，正史可见者有如下材料：

《周书·庾信传》：“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也。祖易，齐征士。父肩吾，梁散骑常侍，中书令。”《北史》所载略同。

《梁书·庾黔娄传》：“庾黔娄字子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征不至，有高名。”

《梁书·庾於陵传》：“庾於陵字子介，散骑常侍黔娄之弟也。……弟肩吾。”

《梁书·庾肩吾传》：“肩吾字子慎，八岁能赋诗，特为兄於陵所友爱。”

《南齐书·庾易传》：“庾易字幼简，新野人也。徙居属江陵。祖孜，巴郡太守，父道骥，安西参军。”

庾孜、庾道骥，正史无传。因此，庾信先世可考者至庾孜而止。

依《南齐书》《梁书》《周书》诸史之例，若传主先世有地位显赫者，例当写入本人传中。即如《周书》中与《庾信传》相接之《颜之仪传》：“颜之仪字子升，琅邪临沂人也，晋侍中含九世孙；祖见

远……父协……”《王褒传》：“王褒字子渊，琅邪临沂人也。曾祖俭，齐侍中、太尉、南昌文宪公。祖騫……父规……”由此看来，庾信先世似无功名地位甚可称述之人。《梁书·庾於陵传》载梁武帝任命他为太子洗马时曰：“官以人而清，岂限甲族。”可知庾氏在南朝时至少算不上甲族。滕王迥序有“贵族华望盛矣哉”的赞叹，客套而已。

庾信《哀江南赋》中有一段自叙家史的文字：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始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水木交运，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阶庭空谷，门巷蒲轮。移谈讲树，就简书筠。降生世德，载诞贞臣。

庾信从其先世得姓氏之初谈起，讲到汉代祖上有坐而论道的三公之官。这位“经邦佐汉”的庾氏祖先，或当指《元和姓纂》卷六所载后汉司空庾孟，为新野人，然其详不可考。

被庾信确认为“吾祖”的，是永嘉乱后随晋元帝南渡的庾滔。庾滔《晋书》无传，但《北史·庾季才传》云：“庾季才字叔奔，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县。”滕王迥序《庾子山集》亦曰：“八世祖滔，散骑常侍、领大著作、遂昌县侯。”因此，庾滔于庾信及庾季才，均为八世祖。

“水木交运”四句，谓宋齐易代之际，庾氏多直道全节之人，似是指其高祖庾孜、曾祖庾道驥。据《南齐书·庾易传》：“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为骠骑参军，不就。”建元元年为齐高帝萧道成

受宋禅之始年，则庾孜、庾道骥之仕，当在宋齐之间。然文献不足征，其详不可知。

“新野有生祠之庙”二句，异说颇多。李审言先生《庾子山〈哀江南赋〉集注》（手稿本，国家图书馆藏）在引录诸家之说后加案语道：“诸说皆为悬揣之词……仁和劳格《读书杂识》‘庾开府集’下云：‘格案，《元和姓纂·六》：庾会为新野太守，百姓为之立祠；支孙庾告云为青州刺史，羌胡为之立碑。’吴（兆宜）注失考，劳氏此注可谓信而有征矣。”

“况乃少微真人”数句，叙其祖父庾易志尚之高。《南齐书·庾易传》说“易志性恬隐，不交外物”。易字幼简，这真是名如其人了。从他给三个儿子取名也颇可看出他志趣所在。长子取名黔娄，据刘向《列女传》，这是战国时齐国一位隐士的名字，生活极其贫困，死时甚至衣不蔽体。次子取名於陵，据刘向说，这是齐国一位廉士的姓，名子终，世人称之为“於陵子”，也就是《孟子·滕文公》中被匡章称为“廉士”的陈仲子。据说楚王闻其贤，欲聘以为相，他就逃走了，为人灌园为生。三子肩吾，则是取名于《庄子·逍遥游》中的人物，据古人注，这是一位“古之怀道者”。

三子取名如此，确是庾易志尚的一个极好而且有趣的证明。他为三子分别取字为子贞、子介、子慎，也表示了他对他们道德品质上的期望与要求。在这位父亲的影响下，黔娄兄弟在官声人品方面，确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贞介之风。庾黔娄被收入《梁书·孝行传》。传中除记载了他常人难以做到的孝行外，还记有如下数事：

梁台建，邓元起为益州刺史，表黔娄为府长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宝山积，元起悉分与僚佐，惟黔娄一无所取。元起恶其异众，厉声曰：“长史何独尔为！”黔娄

示不违之，请书数篋。寻除蜀郡太守，在职清素，百姓便之。

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娄身营殡殓，携持丧柩归乡里。

由此数事看来，黔娄虽未如乃父所望成为隐士，但其立身行事确实有贞介之风。

庾於陵及庾肩吾均见《梁书·文学传》。於陵七岁即能言玄理，这当然是庾易教导的成果。他和其兄黔娄一样，也比较看重君臣名分。齐随王萧子隆为荆州刺史时，召他为主簿，其后不久子隆为齐明帝所害，僚吏均畏祸远避，而庾於陵却为之经理丧事。则“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二句，似乎也可说是信而有征，而非庾信虚美。

然而，黔娄、於陵二人都历仕齐、梁二朝。这在六朝时固为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二人病，但由此却可见庾信所谓“事君彰于义烈”云者，其标准并不高，只不过是對自己“顶头上司”的忠心而已。而且这种忠心，很大程度上与“知遇之恩”有关：黔娄对邓元起之忠，是因为他为益州刺史时召己为长史；於陵对随王萧子隆之忠，是因为萧子隆为荆州刺史时召他为主簿。

《梁书》及《南史》所载庾信父庾肩吾之行事，与“贞臣”“义烈”更有差距。《南史》卷五〇庾肩吾传云：

及简文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时上流蕃镇，并据州拒侯景，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乃降贼，肩吾因逃入东。后贼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欲杀之，先谓曰：“吾闻汝能作诗，今可即作，若能，将贷汝命。”肩吾操笔便成，辞采甚美，子仙乃释以为建昌令。仍间道奔江陵，历江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封武康县侯。卒，赠散骑常侍、中书令。

《梁书》所载与《南史》略同，但有一点重要差异：《梁书》只说萧大心举州降贼后，“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而未提